



【刊前絮语】

手艺的思想

□吉祥

2015年9月,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庆推出的精品大展——石渠宝笈特展开幕,一批传世文物如《清明上河图》、《五牛图》、《游春图》亮相,此后的一个月,故宫人山人海,为了一睹国宝的真容。观众奔跑着冲向展区,即便如此,依然经常要排五六个小时才能匆匆一瞥。

很多人从纪录片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知道了文物修复师这一群体,这个整天与寂寞相伴的群体,一下子成了“网红”,并被贴上了诸如大国工匠这样宏大的时代标签。显然,在日常琐碎而枯燥的工作中,这些词汇很少会出现。对他们来说,择一事,终一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。

上周,故宫古书画装裱修复技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徐建华做客《大众讲坛》。在他眼里,所谓的工匠精神,就是一辈子从头到尾认真干好一件事情。徐建华在故宫待了43年,从部队转业分配到故宫,本想去修表,结果领导一句话,他被安排到了裱画室。那一代人当面临个人兴趣和集体需要的选择时,往往会选择后者,他就这样在裱画室一直干到现在。在讲座中,他经常将从事的修复工作和革命精神、革命情怀这些词联系到一起,“网红”的表达不新潮,有那个年代人的特有痕迹,本职工作和家国情怀就这样被他自然地交织在了一起。

最近读一本书,叫《手艺的思想》,手艺被纳入到文化、传统等等视角下进行考量。听徐建华老师讲文物修复的故事,也能很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。文物修复在古代是士农工商里的“工”,它作为一门手艺有着上千年的历史,这个手艺里包容了文化的传承、古老师徒制的延续等等多种内涵。作为一个技艺高超的手艺人,徐建华参与修复了无数传世名作,有着老一辈手艺人的坚持与骄傲。他有过当官的机会,却不愿意,“我喜欢干这个工作”。时间会丈量一个人的选择,自知当不了干部的徐建华在《游春图》、《五牛图》等等国宝级文物上,留下了自己的痕迹。对比鲜明的是,身边的一个同事,去当了官,成天跑前跑后,看起来忙忙碌碌,结果临退休发现一事无成,“还不如我修点儿国宝。”这些简单的话语,不是徐老师总结出的手艺的思想吗?

石渠宝笈特展时,徐建华挤在人山人海的观众中,但他却不是为参观画作而来,他是来看观众的。“站在那儿,我特高兴,为什么呀?这是我们血汗和智慧的结晶。”你看,这语气多骄傲。徐建华记得,当年的故宫有个规律,不管多大的官来了,也不会对工匠干活造成影响,他们只顾埋头干好自己的活儿。

有人问我,您干了这么多年,您对工匠精神有什么体会?我说工匠精神就是一句话:你干一项工作,从头儿干到尾能干出点成绩来,就是工匠精神。我们故宫人,不管是文物修复者,还是一些勤杂人员,在工作中都是本着爱岗敬业、刻苦钻研,干一行、爱一行的老传统。

我在故宫修复古书画

整理:本报记者 吉祥
口述人:徐建华



修复中的画卷(本版图片由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一书提供)

择一事终一生

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纪录片放之后,好多人找我,都是片子播出之后产生的效应。文物修复工作者本来是一个很寂寞的群体,拍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一开始也是想让年轻一代从后台走到前台,反映他们耐得住寂寞的品质,工作的艰辛和责任,体现他们在工作中的革命精神和奉献精神。

大家都知道黄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》,这幅画如今分隔两地,一半在台北故宫,一半在浙江省博物馆。一次总理记者招待会上,有人问了《富春山居图》的合璧问题,时任总理温家宝就说,希望有一天会合璧的。这个消息正好打动了我们一个老先生,老先生现在已经不在了,他听到消息的时候已经得了白血病,就在病床上给我打电话:我听说《富春山居图》要修,要修的话,请故宫博物院来承担这个责任,由你来主持。我就想,您都得白血病了,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见不着了,心里还想着那么多的事儿。这说明老一代文物修复者对文物的热爱,那么多年一贯的革命情怀。

故宫九十年大庆的时候,很多人都去看石渠宝笈特展,队伍排得是人山人海,争着去看北宋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,我也去看了,我不看画,我看画干吗?我就看观众的反应,对我们使用的修复材料、装裱形式的看法。站在那儿我特高兴,为什么呀?这是我们血汗和智慧的结晶,我去检验成果去了。这也是我们文物修复工作者比较欣慰的地方,那么多人来看《清明上河图》,这《清明上河图》要是不修,不是就没那么多人来看了嘛。

说起《清明上河图》可以再讲一位老先生,那个老先生是我们裱画室的功臣张耀选,他晚年得了老年痴呆,不能出门,他就坐在床上撕被子,家人问他干吗撕被子呢。他就说,我在补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
从造办处到文物医院

介绍一下故宫修复事业的发展历史。解放以前故宫有个造办处,有一些工匠在做修复工作。解放以后,故宫成立了一个修复小组。承担一些文物的修复工作,但是工种比较少,人也少,修一些不是特别重要的文物。之后逐步规范,成立了文物修复厂、文物修复医院。

1953年,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专程到上海,约请几位书画修复高手北上,包括有装裱界梅兰芳之称的杨文斌、古书画修复大师张耀选等,1954年组建了文物修复厂裱画室,奠定了故宫书画修复的基础。

我是1974年到故宫工作的,“文革”进行到中间,已经要和外国进行交流,怎么交流呢?一个是乒乓外交,另一个就是搞出土文物展览。搞出土文物展览就得修理呀。就把这些老先生从干校和老家又请回故宫。老先生们都很兴奋,因为又可以为国家做贡献了。所以说,我的机遇比较好。第一,我来了一个特别好的地方,就是故宫;第二,我又是跟着非常有名的装裱老师学习。我的师父是上海来的杨文斌,扮相好,长相也漂亮,号称上海书画装裱界的梅兰芳。他这个人的工作能力很强,1949年以前,你的水平被公认,那是很不简单的,因为资本家是不会养闲人的。杨文斌老先生是故宫书画装裱业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,他修了很多一级文物,石渠宝笈特展里的画,很多都是当时修的,像《清明上河图》、《游春图》、《五牛图》。我们俩在一起工作,所以就有机会接触一些特别好的文物,使我经过了书画装裱全过程的锻炼。

大家都知道故宫有个很重要的文物韩滉的《五牛图》。那是1977年修的。这幅画是解放初期从香港买的,很贵,买的时候上报国家文物局,后来又报到周总理那里。周总理开了一个玩笑,说这个《五牛图》还是得买,但是这个死牛比活牛还贵。当时咱们国家的经济状况很不好,刚解放嘛,但是最后还是批了。

《五牛图》修复之前破损很严重,有个搞档案的同志在修复前统计了每头牛身上有多少洞,最多的有15个洞,最少的有4个洞。没有画的地方的洞有80多个。

学徒下了大工夫

我进故宫那一年,有一大批年轻人充实到书画装裱行业,当时的院长吴仲超就说有两个任务。第一个就是请这些老先生加紧时间完成故宫要修的一级文物。第二个就是借这个机会,让老先生把年轻的同志培养出来。当时山东去了一个杨正旗,学习的时候三进故宫,他是我们这里边的佼佼者。我是从上海部队转业到故宫的,之前在部队里也搞一些宣传工作,对这个工作也比较喜欢。分配的时候问我喜欢干什么工作,因为我们家本身就是修理钟表的,我就说希望

在故宫修表。院长说,你还是别去修表了,你去书画装裱室。

杨文斌老先生是从上海来的,普通话不怎么会说,我刚好在上海待了五年,听他的话还比较熟,就这样结成了师徒。确定师徒关系以后,他就直接带我,一对一。带我实际上先是考察我,我也得努力工作。8点上班,我都是7点就到,比老师傅还早,因为老师傅7点半就开始干活了。每天一到,我先把他的刀子磨好,把工具都准备好,完了水给他沏上。他一进门,我给他开门。开门让他进来,先歇会儿,抽根烟什么的。作为徒弟,事务性的工作必须得跑在前头,你要不跑到前头,老师傅会说这孩子不行,这孩子太懒,我教不了。故宫没有电炉子,只有水房,每天就去打水、扫院子。那时候也没有物业,我们都是自己干。你做的老先生都看在眼里,记在心里,看你是不是这块料。

师父考验徒弟,拿一张纸让我拓,一开始我也不懂,一拓一个大窟窿,坏了。他过来,知道你就要拓坏,就让你拓,他的目的就是指导你。拓坏了,才可以告诉你怎么拓,很简单的一个方法,拿刷子洒点水,把那纸弄平了,一上浆就行了。就差这么一点,跟窗户纸似的,一捅就破,但是自己一开始就是弄不清。

我学徒也下了大工夫,师父家离故宫特别近,晚上就上他们家,去了以后就问他这个那个。等到他觉得你行了,有点出息了,就开始慢慢地放手了。放手怎么放呢?他在修复《游春图》的时候,就可以过去。过去,站在他边上,站他边上你还不能挡他光。待会儿他瞧你两眼,你不就完了吗?站边上看他弄,看完以后,他抽烟去,你就坐他那凳子上,慢慢拿那笔弄两下,等他过来一看——这弄得还行。心里觉得行,但他嘴上不说。再待两天,他一看你确实有进步,那你也弄吧,爷俩就一起干。他放手让你干,你就得抓紧这个机会。一个是抓紧机会学习,第二个你对老师一定得谦虚。他们家的事甭管是婚丧嫁娶,都得去,当成他们家的孩子。他看病的时候,我跟着去。医生听不懂他说话,怎么办呢?我给他当翻译,我说他喘,感冒了,你给他弄点西药。我还得给他送家去,弄上饭,生炉子。反正家里的事你都得负责,慢慢地他就觉得你这孩子行,就教你做手卷,教你做册页……老先生说:我教得肯定好,比他们教得好。他确实就是从一点一滴来辅导我,教好了以后,一般他就在那儿看了,我来干。

学徒的这一段,我挺辛苦,又觉得挺高兴。老先生也对我特别好,到他家去以后,肯定得在他那儿吃饭啊。还给我介绍对象,师娘介绍的女朋友,师父不同意。师父看的条件比较高,俩人还吵起来了。我说为这个事情吵架不值当,你们俩介绍的我谁都不要。我还是自己搞去。就是说在工作中,有欣慰的地方,也有敬畏的地方,这是一个过程。

(注:本文部分文字据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徐建华口述章节)

